

江山代有才人出

中晚唐五代著名文学家巡礼

李哲人 李卫星 焦传斌 主编

张煦歌 编著

西苑风残照

西苑风残照

西苑出版社

· 江山代有才人出 ·

西风残照

——中晚唐五代著名文学家巡礼

张雅歌 编著

西苑出版社

1402-15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风残照：中晚唐五代著名文学家巡礼/张雅歌编著.
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9

(江山代有才人出)

ISBN 7-80108-232-X

I. 西… II. 张…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五代③文学家—评传—中国—
唐代④文学家—评传—中国—五代 IV. I 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359 号

西风残照——中晚唐五代著名文学家巡礼

编 著 张雅歌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7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173417

印 刷 山东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375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106 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232-X/I·16

定 价：80.00 元(全十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言——中晚唐五代文学概说.....	1
夕贬潮州路八千	
——韩愈和他的散文、诗歌创作.....	9
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和他的诗歌创作	26
惟歌生民病	
——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39
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和他的散文、诗歌创作	52
僧敲月下门	
——以苦吟著称的诗人孟郊、贾岛	72
天若有情天亦老	
——李贺和他的诗歌创作	88
十年一觉扬州梦	
——杜牧和他的诗歌创作.....	102
身无彩凤双飞翼	
——李商隐和他的诗歌创作.....	126

斜晖脉脉水悠悠

——花间派词主温庭筠…………… 145

洛阳才子他乡老

——韦庄和他的词…………… 153

落花流水春去也

——李煜和他的词…………… 160

序 言

——中晚唐五代文学概说

中国是一个诗国，而唐代则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如从《诗经》时代算起，到唐代也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即使是在唐代，中国诗歌也仍在发展变化，并且有新的波澜和高潮。新乐府运动就是出现于中唐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这个运动除了对文学内容的革新和强调写实之外，在创作观上与以往的诗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以往的诗人大抵把创作看成主观情志的表现，认为个人的学识修养是创作优劣的决定因素，而很少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创作源泉这个根本的问题。在艺术追求方面，他们往往以凝练含蓄地写自身的心灵波动为满足，却无意对客观世界作精心的描绘。他们的抒情、议论或感慨，固然也常常“因事而发”，可是当他们把感受写成诗时，却没把重点放在反映现实上。这种情况到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诗人手中才开始改变。

对于新乐府诗人来说，“诗言志”虽然仍是他们的信条，但对仅仅表现情志则不以为然，以讽刺或歌颂的办法来干预政治也是他们所恪守的。他们总是以见证人的身份考察政治现实，并探索其与历史之间的联系，由此搜求创作素材，确定命题。在这一点上和乐府民歌的精神接近，便有意从中汲

取营养，并由用乐府旧题发展到即事名篇、自创新题。

新乐府诗大大增强了内容的客观性，它忠实地反映外界的事物，拓展了诗歌反映的生活面，并使读者读后能获得真切的认识。诗人们不再仅仅为抒发个人情怀而作诗，而是主动地寻找素材作诗，这是创作态度上的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使诗人创作中一向很少的叙事诗在中唐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使诗歌的叙事艺术进了一步。这种种变化在我们介绍的中晚唐一些诗人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为了了解这些诗人，我们不能不对中晚唐的文化状况进行鸟瞰式的扫描，以找到他们的位置和心态。

唐王朝经过八年艰苦的战争，才勉强将安史之乱平定下去。安史之乱这一巨大的政治地震，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唐帝国的基石，虽然它还维持着一统天下，但分崩离析的征兆已经处处显露出来，彻底瓦解的趋势已难挽回。这时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除了宦官掌权之外，就是藩镇割据，藩王坐大，拥兵自重。中央集权制已被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所分解和动摇。

这种离心倾向被历史证明是唐王朝的致命痼疾。事实上，唐王朝就亡在掌握实权的军事野心家之手，而唐亡之后的四分五裂局面，也是这一痼疾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有一种文化现象似乎与政治上的分裂相矛盾，那就是中晚唐的文化艺术还在保持着某种上升的势头。历史文化研究者们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仍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上升的势头有关。

研究者认为，当时整个国民经济虽然还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但商业、交通（包括国际交通）、各

种手工业都有长足的进步。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王室、贵戚、达官和富豪们的生活日益奢侈化，这都刺激了各行各业的发展。行商和旅游享乐的需要，又促使新的行业大批出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王朝后期对东南沿海经济的依赖，使以沿海港口为出发点的丝绸之路大有取代由长安通向西域的商路之势。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虽然国内忧患丛生，国势日衰，但在东亚乃至世界，唐帝国依然不失为头等强国，是众所瞩目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外国商旅、僧徒向往的乐土。

文化发展与其他事业的发展相比，它有极强的惯性，也就是继承性和积累性。由于初唐奠定的良好的文化基础，加之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文化的适应，这就给中晚唐的文化取得新成就创造了条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文化发展离不开经济力量的养育和支持，但却最不需要政治力量的控制。所以唐王朝这个历史时期经济繁荣而政治控制日益松弛的大形势，实在给文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局面。这不单单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辉煌，就是在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等艺术领域都出现了顶峰之作，连科学技术如雕板印刷术等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谈文学艺术离不开文学家们的思想和心态。但在唐代，与文学家们的思想和心态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儒、道、释三教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还是以孔孟为标榜的儒学。儒学自孔孟创始，至汉代被定为一尊以来，日益完善和深入人心，日益渗透到中国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已成为中国从老百姓到士大夫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准则，把儒学自觉不自觉地奉为最高典范。这对于理解中晚唐作家诗人的

心态非常重要。

这些作家虽然各有爱好和信仰，如白居易信佛、韩愈辟佛而食丹、李贺排道而信佛、李商隐出入佛道两家……但归根到底，他们仍脱不了信奉孔孟之道的儒生本色。尽管他们平常学道、学佛，与和尚道士交往酬唱，在诗文中宣扬佛旨道义，政治观、人生观、艺术观很不一致，但有一种基本上共同的文化心态，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与藩镇割据的“离心倾向”针锋相对的“向心倾向”。在安史之乱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一些文人还保持着这种倾向。他们从内心深处依然拥戴李唐王室，希望它能重振雄风，摆脱衰竭的困境，走向“中兴”。他们固守“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儒家教条，而且心目中的天子仍然必须出自李唐宗室。

由于这种“向心倾向”，他们总对朝廷的种种弊政感到痛心疾首，而想加以某种改革。他们对据地称雄的藩镇，尤其是对那些无礼于朝廷或破坏祖制的藩镇特别憎恨。对那些藩镇的野心抱着极高的警惕，总提醒朝廷不可掉以轻心。

当朝廷决定讨伐叛逆的藩镇时，他们极力拥护并竭力促成，一旦朝廷姑息退让，他们便竭力反对或惋惜慨叹不止。有的文人在藩镇幕府作幕僚，遇到主子图谋不轨，他们或劝或阻，或给朝廷报警，起码也是阳奉阴违，甚至倒戈“反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们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著名诗人的言行或诗文都有突出的表现。

中晚唐时期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对李唐王朝痴情眷恋，忠心耿耿。他们的政治立场非常坚定，社会责任感非常强烈，为维护这个王朝的统一和长治久安竭尽全力。历史的事实也确

实说明，这种“向心倾向”的强弱与有无，正是一个王朝的统治是否巩固和能否维持下去的重要根据和标志之一。知识分子是国民中最具有政治敏感的部分，但又是思想多于行动，言论强于实践。他们既不会轻易拥戴一个政权，也不会轻易反对它，除非对它彻底失望。唐朝末期，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离开长安，到有明显“离心倾心”的地方政权中任职，这就预示着唐王朝的气数将尽，离彻底灭亡为期不远了。

中晚唐知识分子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心态，针对不同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表现，其表现形式又有积极、消极、强烈、平和的不同。而更加普遍、经常的表现，则是深沉郁结的忧患意识。这几乎成为中晚唐时期的诗人作品中的基本旋律。这种忧患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益浓重，愈益带有凄凉萧瑟乃至悲观绝望的意味。

咏古之作往往是诗人借古讽今的一种手段，不同时期的作品所流露的诗人的忧患意识，其轻重浓淡各有不同。例如先前的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有感于“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沧桑巨变，对天宝朝政充满忧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但到了刘禹锡，同样是感慨三国、两晋的政权变迁，可是《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等作的情绪，却比前者痛切深沉得多。到了李商隐，那些咏叹南朝、隋朝短祚速亡的诗篇，不但深沉痛切，而且几乎是掩抑不住地流溢着对现实的危机和毁灭感。其中虽然也流露出一些惨淡的热情或希望，但已是深秋蝉鸣，哀哀挽歌，令人悚然而惧、不寒而栗了。

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向心倾向和对现实的忧患意识，是中晚唐诗人的主要文化心态，反映在作品中则是浓重的感伤

色彩和悲苦情调。身体孱弱、年寿不永的李贺如此；在政治斗争中屡遭失败的刘禹锡、柳宗元如此；胸怀大志而仕途蹭蹬失意虽幸存于宦海、位高禄厚却“勘破红尘”的白居易也不例外；就是一生坚持入世的生活态度、性格倔强、文风雄阔的韩愈，其诗作内涵深处也回响着时代的悲音。明代有位专家这样说韩愈：“韩退之多悲。诗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其实，就是无哭泣字样的诗篇，如《谒衡岳庙》向以豪放著称，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听出深深的忧伤和悲愤，只不过这种忧伤悲愤与雄壮相结合，给人以悲壮的印象罢了。而被韩愈所欣赏的苦吟派诗人孟郊、贾岛，其作品的主旋律更是被苦涩悲凄之音所笼罩。在这方面，李商隐更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诗人。他的诗无不充满了这种几乎可称为时代病的忧郁感伤。《登乐游原》是他的一首写景抒怀的即兴之作，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联却极为准确生动地概括了这一时代的特征。它的深刻含义固然与历代阐释者挖掘有关，但主要还是诗人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意念反映。李商隐这首诗极短，但却是晚唐时代面貌的传神体现，是时代氛围的最佳象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多种，如每个人的秉性、做诗习惯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每况愈下的时代氛围所酿成的文化心态，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和感伤情绪。所以，最能反映时代面貌、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是那最多最丰富地渗透着当代人们文化心态的精神产品。就这一点来说，本书将提到的杜牧、温庭筠虽然也是优秀诗人，但他们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地位，与前面的诗人相比就有所不同了。

总的来说，中晚唐政局虽日益不景气，但诗坛仍很繁荣，

存在着多种诗派和许多有特色的诗人，然而没有出现可与盛唐杰出诗人并称的大家巨匠。这是因为唐诗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各种诗体、表现形式、表现手法都已成熟、定型，有了一整套可以依循的经验。虽然也有些发展，但基本上是总结、积累和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人看到元、白的讽喻诗直接干预现实的不成功，而在创作心理上发生了变化，自觉不自觉地又回到以诗抒写自我心灵的路子上去，通过表现个人的遭际与心灵的波动，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因为他们明白这不是大声疾呼、大张挞伐的时代，文学的批判已经无能为力，历史只有靠武器的批判才能掀开新的一页。正因如此，这又是一个诗艺成熟的时代，不但流派繁多，而且诗体完备，各以自身的才力驰骋于诗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抒写性灵、反映社会，给晚唐时代留下了真实的写照。而对现实不满、情调低沉、色彩晦暗、意境朦胧、词藻华丽则是晚唐诗风的共同特征。

对这种诗风，过分贬低或笼统否定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是时代的反映。文学虽然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但说到底它的职责只是对当代的某种生活作出反映。这是它存在的价值，也是它的局限。

应该一提的是中晚唐文人词的出现。在唐代城市繁荣、音乐发达、歌楼妓馆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出现了配合“胡夷里巷”歌曲的曲子调。中唐时代开始有文人词出现。到晚唐时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文人词内容偏于艳情，成就不大，但艺术上有独创性，影响较深远。

唐帝国灭亡之后，藩镇割据仍延续下来，成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当时北方战争频仍，文学没有什么成就。南方

十国之间虽然也有战争，但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特别是南唐、后蜀国势较强，历史较久，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后蜀在温庭筠的直接影响下，出现了一批花间派词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变化。韦庄向来和温庭筠齐名，他的词稍有内容，有较多的个人抒情意味，风格也较温词清新明朗，有一定的意义。南唐词人冯延巳和李璟、李煜父子的词内容仍很狭窄，感情也不够健康，但浓艳与脂粉气少了。李煜在亡国后从南唐国主降为囚徒，明显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写了一些个人国破家亡的感受，直抒胸臆，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艺术上也有独特成就，对后来词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中晚唐五代的诗、词作家也是灿若星辰，历来的评介阐释也浩如烟海。本书从中挑选出几位在某些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简单作些介绍，甚至是从某一个视角略作一瞥。它既不是学术论著，也不是辞书典籍，甚至连诗话都不是。这有如从万团丝线中抽出一根线头，而涉及到某位诗人的，也不过是龙之一鳞、凤之一羽，目的在于引起爱好古诗词的青年朋友产生一点兴趣，以便有朝一日深入地研读他们的作品。

夕贬潮州路八千

——韩愈和他的散文、诗歌创作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就始于韩愈。骈文这一文体多用四、六字成句，也叫四六文。它讲究对仗，偏重形式，多堆砌词藻、典故，六朝以来流传已久，成了表达思想内容的桎梏。自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开始，后来又经柳宗元的大力支持，业绩显著，影响更大，古文逐渐压倒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

韩愈是我国古代散文大家，是运用语言的巨匠。他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且流畅明快，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他的语言简练准确、鲜明生动、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他新创的许多语句如“佞屈聱牙”、“动辄得咎”、“俯首贴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杂乱无章”、“落井下石”等等，已成为成语，至今被人们广为运用。

韩愈不仅是杰出的散文家，也是在中唐诗坛上能够别开生面、勇于独创的诗人。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三岁时成了孤儿，由兄嫂抚养成人。由于学习刻苦，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二十九岁便登上仕途，但在科名和仕途上却不顺利，屡屡受挫，也属怀才不遇者。他先后做过汴州观察推官、

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上，他曾因关中旱灾饥荒，上疏直言，劝谏唐德宗减免关中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触怒了权贵，被贬为阳山令。永贞元年（805）唐宪宗大赦天下，但他仍不能回朝任职，改官江陵（今湖北江陵）任法曹参军。元和十二年（817）七月韩愈任彰义行军司马，随同宰相裴度讨伐叛军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第二年，又因上疏《论佛骨表》，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触怒了宪宗，几乎被杀，经裴度等人说情，改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任兵部侍郎，又转为吏部侍郎。终年五十七岁。

作为散文人家的韩愈，他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这无疑对他的散文创作有很大影响。但当他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来观察问题时，就自然地突破了陈腐的儒家正统思想的羁绊，因而他的创作和理论就会放射出动人的光辉。他的散文中成就最高的显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对黑暗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板着面孔为儒道说教的文章。他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特别是一些“杂著”、“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的完整统一。像《杂说四》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比喻，说明贤才难遇知己，“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全文不过一百五十字左右，简短明快，而又多转折变化，十分饱满地表达了一腔委屈：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骐死

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不饱~~~~尽粟一石~~~~常~~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要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为文与为人的关系上，韩愈首先强调作家的个人修养，他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养。对于文学语言，韩愈重视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和创造，坚决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他主张学习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在运用语言方面，他认为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而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使“文章言语，与事相侔”；还必须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

历来人们对韩愈的散文推崇备至，而对他的诗却多有褒贬，这大概是由于他为探索诗歌的新形式、新风格，也付出了不少失败的代价的缘故吧。但我们应该看到，他在辛勤的探索中花费了很多心血，的确为诗歌开拓了一条和李杜完全不同的道路，创作了一些独具风格的优秀诗篇。

开创中唐诗坛的新局面

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同时，也曾致力于诗歌的革新，以纠正“大历十才子”的平庸之风。这帮诗人的诗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大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在艺术方面虽都有一定的修养，但并无鲜明的艺术特色，倒有形式主义的倾向。韩愈的诗歌不仅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之风，而且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这期间他曾写过一首《调张籍》的诗，简直像诗界异军崛起的宣言。这首诗热情地赞美李杜的诗文，表现出高度的倾慕之情。在当时李杜的诗歌成就还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还受到一些人的贬抑，而韩愈却对李杜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训斥“群儿”谤伤前辈的无知可笑。这在对李杜诗歌的评价上比同时的人要高明得多。

我们不妨就这首诗的简单分析，来看韩愈对李杜诗歌的评价和这首诗本身的艺术形象以及他对诗歌的一些精到见解。

全诗共四十句，可分为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对李杜诗文作出了极高的总体评价；中间二十二句为第二段，写对李杜的敬仰，赞美他们诗歌的高度成就；末十二句为第三段，写自己努力追随李杜，并劝老友张籍和他一起向李杜学习。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